

叢書集成初編

總目索引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易林彙校集注/(舊題漢)焦延壽撰;徐傳武,胡真
校點集注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.3
(中華要籍集釋叢書)
ISBN 978-7-5325-6172-8

I. ①易... II. ①焦... ②徐... ③胡... III. ①占卜—
中國—古代 ②易林—注釋 IV. ①B992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244281 號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中華要籍集釋叢書

易林彙校集注

(全三冊)

[舊題漢]焦延壽 撰

徐傳武 胡真 校點集注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常熟市華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76.375 插頁 12 字數 1,300,000

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3,300

ISBN 978-7-5325-6172-8

B·767 定價: 228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《中華要籍集釋叢書》出版說明

中華文化博大精深，源遠流長。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中，代有英傑，人才輩出，曾經出現過許多堪稱經典的著作，涉及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，包括哲學、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歷史、文學等各個學科。這些著作不僅在當時產生過巨大的作用，而且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，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，其中蘊含的思想智慧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體現。歷朝歷代的學者俊彥，或身體力行，或著書立說，為之闡釋發揮，形成更為豐富的思想文化寶庫。

由于年代久遠，這些經典連同歷朝歷代積累下來的注釋，對於現代的讀者來說，在時代背景和語言敘述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距離。隨着時代的發展，現代的學人也有義務有責任要為這些經典及其注釋加以整理總結，為新時期讀者所用。為此，經王元化先生倡議策劃，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特主持並資助出版《中華要籍集釋叢書》，以總結二十世紀之前的學術成果，為新千年的文化事業作出貢獻。

《中華要籍集釋叢書》入選的圖書，以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為主，包括哲學、歷史、文學等各個學科。叢書各種均選擇精良的版本加以校勘，以彙集前人注釋成果和體現當代學術水準為主。叢書各種雖有大致統一的體例，但撰者在闡釋和評注方面可有各自的特色，以體現不同的風格及整理者的學術成果。

本叢書由錢伯城先生任主編，編輯出版工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擔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《易林》平議（代序）

徐傳武 胡 真

對一部古籍進行了一番整理和研究之後，想作些議論品評却無從說起，這不能不說是件怪事。若按常理，無非書名、作者、內容、價值和意義……娓娓道來，並非難事。可現在的對象，在主要的三大要素，即書名、作者和內容上都有着複雜的不確定因素，每一件都遠不是一言可決的，所以這篇文章也就不得不作一些從權的變化，看起來或許非驢非馬，望讀者原宥。

既然諸要素都有不確定性，却又必須要開始探討，那就先將書名「強名之」為：《易林》。

一、《易林》的內容

《易林》是為《周易》服務的書，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。因為不僅我們現在要說的這一部，在《隋書·經籍志》記錄的與《周易》有關的著述中，「易林」或者「易林」的衍生名（《周易林》、《周易守林》、《周易新林》、《易林要決》等）就比比皆是。所以，演繹《周易》的著作很喜歡稱「林」，而這或許和「注」、「箋」一樣也是一種特定的方法，但這一點很難定論，因為雖然歷代書目中有許多的「易林」，完整流傳下來的却極少，除了現在要說的這部漢朝的著作外，就沒有可以拿來作相當的比較的了，清人凌堃所著的《易林》就是明顯的仿作，無法證明歷史上曾有的那許多《易林》也都是這個樣子。既然如此，就只

能說這一部《易林》是如何演繹《周易》的了。

《周易》是一部卜筮之書，通俗地說，就是算卦用的書，設立一個符號系統來對應種種事物，以期達到掌控未知的目的。《周易》的符號系統便是六十四卦，其基本元素是「一」和「--」兩個，分別代表陽和陰，然後把它們六個為一組排列組合地堆疊起來，就有了六十四種不同組合，即六十四卦，每卦六爻，共計三百八十四爻。人們可以通過簡單的方法或儀式得到一個符號，精確到卦或爻都不是問題。但得到符號不是目的，還要知道符號代表什麼，尤其是如何用於自己眼前想了解或解決的問題。《周易》的主要任務就是充當其間的媒介，它為每卦、每爻都設定了解說，這就是卦爻辭，當然，卦爻辭的語言是不會傳達精確信息的，依然要想像、類比、揣摩，但這樣的參考有總比無好。

《周易》是先秦時代就有了的，要是追溯其發展史就更早了，但後人始終不很清楚當時的人們用《周易》占卜的重要細節，比如究竟如何得到一卦、得到一卦之後如何擇取卦爻辭——畢竟一卦有六爻，除了卦辭，爻辭如何利用？雖然《周易》中也有些解說，雖然《左傳》之類的先秦文獻中也有些實例，但都不足以構建一個可以付諸實際操作的縝密方案，這些問題也就一直困擾着人們。比如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中記錄的易卜過程，常常說遇到一事，卜，得「某卦之某卦」，「之」在這裏是往、到的意思。占卜求卦，求一個只需抽籤即可，同時求兩個（還是動態的，一個到另一個）該怎麼做呢？二千多年後的朱熹找到了一個比較麻煩却令人信服的辦法。卦是六爻構成的，求卦時不是囫圇求一個卦，而是拆開來一爻一爻求，所求每一爻都存在四種可能：陰、陽、陰變陽、陽變陰。等六個爻都出來，成了一卦，這卦除非每爻都不變，否則，不管一爻變還是六爻都變，那就是某卦之某卦，然後再定義好各種情況，分別以哪個爻辭或卦辭作結論就

萬事大吉了。後來的人們多以這套方案來操作易卜，這也算易學的人門知識，姑不細述，詳見附錄《易林筮儀》。（朱熹《周易本義》中題目叫《筮儀》，二者內容一致，當是刻《易林》者的抄錄，不過也有人說是朱熹抄自《易林》而沒有聲明，不可信。）

朱熹是南宋人，朱熹的方法雖不完全是他自己想出來的，但總是在他身後才成為主流的易卜方法，而朱熹之前的那些人也並非都閒着，《易林》也是解決方案之一。朱熹的出發點是如何利用《周易》的文本，而《易林》的思路不同：不是搞不清「某卦之某卦」要用哪一句嗎？那就全別用了，我另外拿一套辭出來，所有的「某卦之某卦」（含不變卦）一個不缺。這一套是多少條呢？算一下就知道了，*check it out*。所以，《易林》是一本由四千零九十六條類似卦爻辭的文字組成的書，習慣上稱之為四千零九十六則「林詞」（也作「林辭」）。要補充說明的有兩點：一、四千零九十六條文字頗有重複，有一字不差的重複，也有稍差一兩字的，有一點點相似的更多。二、《易林》的每一條都是詩體，絕大部分是四言詩，極為罕見的有幾條三言的或雜言的，少的兩句，多的七八句。

二、《易林》的機理

在關心其他重要問題之前，還必須探討一下《易林》的機理，就是說它的創作是出於什麼動機、遵循什麼規律。

依據此前對易卜的簡述，《易林》的創作動機不難解釋，用胡適先生的話說：「只是一部卜卦的繇辭，等於後世的神廟籤詩，他本身並沒有思想史料的價值。」這書就是為卜卦而作的，就是由一批富含象

徵意義、能昭示吉凶悔吝的語句組成。如此，也就無怪乎沒有思想價值、史料價值了。且取它的第一條來看一下：

道陟石阪，胡言連蹇，譯瘖且聾，莫使道通，請謁不行，求事無功。

有相對清楚、完整的含義，似乎是個事件，也可能只是個假託的場景，絕不是所見所聞的具體事實，也不含任何思辨觀點，僅僅表示費力、難於成功的境況。這就足够了，算卦占卜，要知道的不就是能否成功、是否順利嗎？不管具體以什麼事、物、景作載體，也不管它是比喻、暗示、象徵，四千零九十六則林詞大抵都是如此。如果只是這樣的廟籤，昭示各式不同的吉凶順逆，一般人都不能寫出來。但《易林》的作者不僅諳熟易理，知道每一林應如何表述，字裏行間也透露出深厚的文化素養。比如小過之漸：

中田有廬，疆場有瓜，獻進皇祖，曾孫壽考。

用的全是《詩經》中的成句，其他林詞中夾雜一兩句詩句的就更不可枚舉了。再比如乾之兌：

鷁飛中退，舉事不遂，宋人亂潰。

這是《春秋》僖公十六年、二十二年宋國兩件大事的合寫，全都有案可查。這種類似詩文用典的林詞不在少數，只是漢代人所知的傳說史實肯定較後人為多，所以令人覺得有故實却不知所云的林詞也有一些，如坤之噬嗑：

稷為堯使，西見王母，拜請百福，賜我喜子。

后稷是周朝的祖先，被後人尊為農神，被堯派作使者去見西王母，這事在現存的文獻中不見記載，可能是漢朝時候的逸說傳聞吧。到此為止，我們還不願懷疑《易林》中有生造的故事，因為作者的知識面廣、

閱讀量大，林詞中至今能考出典源的掌故終究是主流。但細細挖掘，也能發現一些難解的例子。如訟之家

人：

戴堯扶禹，松喬彭祖，西遇王母，道路夷易，無敢難者。

一個畫面之中出現了六個上古人物：堯、禹、赤松子、王子喬、彭祖、西王母，是否真有這樣的傳聞故事，很令人踟躕。更有甚者，如謙：

王喬無病，狗頭不痛，亡跛失履，乏我徒從。

王子喬又出場了，却跟了一句「狗頭不痛」，很有些荒誕色彩。

再要深入一步去研究這些林詞，就不得不對其創作所遵循的規律作出判斷了。於是，又回到胡適先生那半句話：「他本身並沒有思想史料的價值。」這麼說是出於一種假想：《易林》的創作既不是為了論理，也不是為了記事，和抒情審美同樣無關。《易林》只是廟籤，給出一個模糊的吉凶暗示就行，不好辦的事就說「請謁不行，求事無功」，安詳和諧就說「中田有廬，疆場有瓜」，如此而已。至於哪一卦該如何描述、是吉是凶，那是易學的事，外人不知，權當他自有神通，一切了然於心。既然是這樣，林詞中或有看似尋常的邏輯、理論及事實，也都當不得真，只是用來描摹數千種各不相同的吉凶表徵的工具。正如莊子只是講他的道家理論，興之所至就隨手編個小故事，孔子的、楚王的、堯舜的，其實都是瞎編的，本不是為了告訴你這樣的事，而是要你通過故事去悟解其中的道理。

然而《易林》這部「廟籤大全」真的就是這樣寫出來的嗎？書是怎麼寫出來的，事關如何去讀它、用它。兩千年來人們始終不能確定《易林》到底依傍什麼樣的準則進行創作，所以一直按照一般的讀書法去

讀它，並非讀不通，也並非毫無助益，只用未濟之无妄林詞的一句說，叫做「求麋耕田」，實在是不得其法。書沒有好好利用還只是一件小事，更是由於這番不解，又衍生出許多學術上的官司公案，以至於說到現在還不能涉及書名和作者。

三、《易林》的利用

如果不出本位的話，《易林》這套廟籤應該是歷久相傳的占卜工具才對，而事實並不完全如此。拿《易林》占卜，有兩個很著名的案例，一個載於《東觀漢記》，是東漢時期的事；另一個載於《因話錄》，是唐朝的事。後來其它的類似記載也有一些，但總其所有也不過有數的幾條，不足以說明人們主要拿它作占卜書用。

中國歷代流傳的書籍浩如煙海，讀書、著書始終是持續的、成規模的活動。在讀書的旨趣上，一般是側重於思想性、真實性，所以經史之學尤為發達，詩詞文賦相對看得輕一些，實用性的技術書籍就有些等而下之了。同時，人們對各種書籍有着明顯的崇尚傾向，一說到書和學問，動輒三墳五典、九丘八索。這樣的情形加於《易林》，便引出了許多怪事。

《易林》符合人們的崇古心理，由於技術條件限制，漢人的著作在中國現存古籍中毫無疑義地可以算作「古書」，《易林》的「品相」又特佳，不僅保存完整，而且篇幅不小，它的字數置於十三經中足以位列三甲。按理說，應該很被讀書人看重。但是很不幸，這書雖然够古够大，却不經不史不詩文，真要歸類，它還是一本實用的技術書，只是這技術比較奇特——易卜技術。本來，這也無大影響，《周易》早就位列

經書，作為易卜的技術書，縱不算經書，當作輔翼經學的工具書，如《爾雅》、《說文》，也該不成問題。但是易理深奧，久失傳承，後人又不明白《易林》的機理，徒然看見一堆卦名和相應的林詞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於是，《易林》這書好是好，就是無從閱讀，它字面淺顯，不說事，不論理，基本每句話都能讀懂，而又無法整體把握。中國古籍中也多了這一種怪書：年代够早，部頭够大，兩千年間却無人認真作注，讀書人的旁徵博引也百不及一——《易林》幾乎成為史上外觀最華麗的「廢書」。

不過，古人讀書是成規模的，無數人可以潛心讀一輩子書，只要是古書，就有研讀的動力；只要有動力，哪怕通篇蝌蚪文也能前赴後繼地「變廢為寶」。沈寂了千年之後，《易林》終於漸漸被人挖掘出來加以利用。

一類用法是為經學服務。《易林》本來就是易學著作，但師說失傳，二者關聯不得而詳，於是就有人另辟蹊徑，將《易林》作為研究《詩》的素材。《易林》雖引了一些《詩經》中的句子，但終究不擔承說《詩》的責任，看似沒多大意義，但聰明人是會從新穎的角度思考問題的。《詩》是韻文，但《詩》韻和唐人以後作詩的詩韻大相逕庭，和宋元之後口語的語音差別更大，《詩經》研究便有了一個分支，即專門探討先秦音韻的古音韻學。《詩經》只有三百多首，不及《全唐詩》的百分之一，單靠這點素材無法充分勾勒出當時漢字之間的音韻關聯狀況，而先秦除了《詩經》之外的詩歌也不多，於是就要廣及各種文獻中散見的韻語。還不够用，便要再涉及一些「去古未遠」的漢代文獻。《易林》正好是四千多首詩，正是絕佳素材。最早對這一素材加以系統利用的，是宋代的吳棫，到明代陳第作《毛詩古音考》也用了《易林》，清代以後便屢見不鮮了。還有一個經學上相對冷門的研究方向，即所謂三家詩。（西漢設為學官的、早已亡佚

的三家解說《詩》的學派，分別是齊詩、魯詩和韓詩，唯獨當時與之並行的毛詩完整流傳至今。）三家說整體雖佚，但仍有不少痕迹散見於各種典籍，所以對三家遺說的整理也成為《詩經》研究的一項工作。清代陳壽祺、陳喬樞父子便將《易林》中有關《詩》的內容視為齊詩遺說，在《齊詩遺說考》中進行了詳細的羅列與考辨。

另一類用法是替文學張本。既然《易林》的整體難於把握，索性拿它當詩來讀，排沙揀金、百裏挑一地選幾十首把玩一番終不是難事。這樣的做法大致從明朝開始大行其道，楊慎說《易林》「或似詩，或似樂府、童謠，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，過矣。」鍾惺、譚元春編《古詩歸》真的選了五十多則林詞充作詩歌，並說：「《易林》以理數立書，文非所重，然其筆力之高、筆意之妙，有數十百言所不能盡，而藏裏迴翔於一字一句之中，寬然有餘者，其鍛煉精簡，未可謂無意為文也。」其餘諸說錢鍾書先生《管錐編》也俱有引徵，詳見附錄。而《管錐編》其書中也獨立二部，專談《易林》文辭之妙，可謂總明人以來之大成。

如果除去目錄學著作和類書不論，古人詩文及著述中談及《易林》的，十之八九屬於以上兩類利用之一。在真正的易學著作中，則多以之為易學發展中一個標志而泛泛提及，直到清末的易學大家尚秉和出世，方才徹底結束這樣的詭異現象。

四、《易林》的回歸

上述對《易林》的種種「利用」，在漢代的古籍中可謂絕無僅有——哪有這樣一部大書，積兩千年之久，終是被人旁敲側擊地使用而不從正面加以研究的？

這便又要說到一句老話：「易道廣大，無所不包。」易學史真是一門悲欣交集的專門史，早在焚書坑儒的年代，《周易》就因占卜書的身份逃得一劫，但易學本身却糾結了太多繁複的內涵，象、數、理都是《周易》研究的方法論。所以，《周易》的文本雖得以保留，其各種研究方向却成為此消彼長的焦點。自從王弼掃象，專重義理之後，象數之學一直處於蟄伏狀態，儘管漢人舊說俱在，却被有意無意地視而不見。宋元明清，象數學稍稍漸復，然而由於《周易》官定經書的作用，始終未能真正使易學回歸到正常的軌道。這些內容在各類易學源流的闡述中都有介紹，姑且不煩多引，只歸結為一句話：《易》是經書中最受重視的一種，同時必然也是最受剪削的一種——各樣不同的研究方法、角度多被剪削而獨尊一門。然而，《周易》自身蘊含的活力卻從不曾消失。這是一段學術背景。

清至民國之間，是西學東漸、科舉廢除的時代，原本地位最為穩固的《周易》在傳統的慣性中仍受推崇，新潮的思想同樣願意發掘《周易》中的智慧，《周易》成了新舊勢力溝通的話語紐帶，康梁變法便曾以《周易》中的「窮則變、變則通、通則久」作為口號，相比之下，一度耗費不少學人精力的公羊學說多少顯得有些不實用。這又是一段時事背景。

在這雙重背景的作用下，《易林》迎來一個回歸易學的契機，可以說是出乎意料，也可以說是合乎情理。這對《易林》來說是件大事，對易學或學術却是平平。如果只是拿《易林》作為一部古籍，試問可否能找出第二部漢代之前的書，字數數萬，却兩千年來用作旁門，直到清末才得以回歸本旨？絕無僅有！所以是小事。但置於易學或學術的領域來考量，這又何足挂齒呢？

那麼，《易林》究竟作了什麼樣的回歸，值得如此大書特書？這就必須說到尚秉和的貢獻了。

尚秉和（一八七〇—一九五〇），字節之，號滋溪老人、槐軒先生。河北行唐人。十八歲入邑庠，二十三歲師事桐城吳汝綸，三十三歲中進士，歷任工部、民政部、內務部主事員外郎。晚年專精治易，對《易林》用功尤多，備受學界推崇。

尚秉和研究《易林》的出發點是與眾不同的。他認為，四千多條的《易林》「必有物焉以主其辭」（黃壽祺《焦氏易詁叙》），這個「物」也就相當於前文所說的創作所循的規律。易是一個巨大的符號體系，易學中有象、數、理等不同的元素，用現代語言說，易中除了有數理模式、哲學模式之外，它還自有一套卦爻與萬事萬物相對應的規則。《周易》的卦爻辭在昭示吉凶的同時，為什麼會涉及種種具體的事物？《周易》中乾卦的主人公是龍，漸卦的主人公是鴻，為什麼？這就是易學中象學分支所關注的問題。

易中的象，簡單的方面可謂盡人皆知，乾為天、坤為地、坎為水、離為火之類，不妨視為常識。然而，易學中關於象的法則却遠遠複雜得多，自從漢代師說失傳，人們只能根據文獻中的片言隻語來猜度。易象主要依據三爻卦為說，但解說的對象主要又是六爻卦，舉例而言，同人䷌，由乾䷀、離䷝合成，於是，要說同人卦的象，本應不外乎在乾、離二卦上作文章。但事實上，在具體問題面前遠遠不夠用，同人卦的初九說：「同人于門。」「同人」是卦名，且不管它，這「門」怎麼解釋？漢末的虞翻說乾為門，後人說這叫「逸象」，《易經》裏沒有。宋代的朱震換個角度，非要把原卦變一下，讓初九爻變陰，下卦成了艮，艮為門。尚秉和又說，他們都不對，二是坤爻（據明來知德「正位」說），坤為門戶，初九離它最近，所以「同人于門」。為了一個「門」字，便有這許多異說，象學的複雜可想而知。然而無論如何複雜，象學的要義無非是兩條：一是合情合理地猜，二是使之自成系統、不自相矛盾。這說來容易，做起來却很

困難。比如虞翻就提出過「半象」的概念，即三爻卦中取其二，兌☱的上二爻與坎☵相同，巽☴的下二爻與坎☵相同，所以它們的象也相通。清代焦循表示懷疑：這麼說來，乾☰既是巽☴的一半，又是兌☱的一半，如何區分？震☳的下半就是坎☵的上半，如何區分？坎☵的一半同時又可看作兌☱、巽☴的一半，又如何區分？焦循提出的問題後來又被與尚秉和齊名的杭辛齋解答了。是非姑且不論，易象學的困難却已顯現無遺。《易經》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體系，在《易經》內部進行象學探究，空間是有限的。於是，尚秉和開拓了新的戰場，他用易象學的理论逐一詮釋《易林》的四千零九十六詞，終於收到了可喜的效果。他基本打通了《易林》依據易象進行創作的原委，從整體上證明了《易林》的林詞字字有來歷、有緣故，而這個來歷、緣故無非易象。舉一個較有代表性的例子，師之蠱：

精潔塞淵，為讒所言，證訊詰問，繫於枳溫，甘棠聽斷，怡然蒙恩。

僅從文史角度理解，並不見難，大致是從《詩經·行露》翻出來的，但是，翟云升有個百思不解的問題：

惟枳、溫皆魏地為難通，或自誤耳。

枳、溫是兩個全不相干的地名，出現在這裏的確匪夷所思，翟云升找不到答案，只好說「或自誤耳」。但尚秉和找到了：

震為精潔，兌為淵，坎為塞。三上正反震，故曰讒言、曰讒問。巽木為枳，艮火為溫，故曰枳溫。巽為棠，初四正反兌，故曰聽斷。兌為耳，為聽，為恩。

同時他還補充道：

凡《易林》用字，無論地名、人名，無不從象生。

至此，《易林》的創作規律也就得以清晰展現了：當兩個六爻卦構成一組，再輔以一些常用的易學公式，就一定能得到若干個三爻卦，這些三爻卦又分別能指向許多具體的象，將這些象用一段可讀的四言韻文串連起來，並清楚地表明吉凶判定，就是《易林》的基礎任務。

只完成基礎任務不難，羅列一些相關的具體事物即可，但那樣做的話將得到一份蕪雜瑣碎、不堪卒讀的列表。《易林》的可貴之處在於，它不僅完成了基本任務，還將其詩歌化，又額外利用了當世所有的知識，不論詩文、史實，只要能和當前易象相吻合，便充分加以利用，偶爾有衝突，可以犧牲真實性而湊合易象，比如上例，易象有枳、溫而原詩沒有，那就把詩和史料略作變形。

這就是尚秉和得出的結論，不是通過幾條林詞加以驗證，而是給四千零九十六詞全體作了一遍注解，是一個能在《易林》全書中左右逢源、回環相證的結論。正因為如此，尚秉和的朋友、大學者王樹枏方敢稱其「將二千年易家之盲詞囈說一一駁倒」。

五、《易林》的作者

到現在為止剛剛涉及《易林》的作者，並且連書名都一直用《易林》而從不出現它另一個常用名《焦氏易林》，這實在是由於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所致，時至今日，仍有不少學者對這問題耿耿於懷，故而必須把此前這些事交待清楚之後再細說。

這部《易林》，歷代通行的說法都認為是由漢代的焦延壽所作。焦延壽，字贛，西漢人，《漢書》中沒有專傳，但在《儒林傳》、《京房傳》中有一些介紹，的確是一位在易學方面頗有造詣的學者。不過，整

部《漢書》中沒有任何記載能說明焦延壽寫過《易林》，最早把焦延壽和《易林》牽到一起的，是幾百年後的《隋書·藝文志》。衆所周知，由於技術手段的限制，絕大部分流傳後世的古書都是僅就內容而言，並非指其實體。比如《史記》，雖說是漢朝的書，但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實體書却是宋朝人的刊印本，印刷術普及之前的古書大多是這種情形，偶然有些出土的竹簡、帛書，不僅數量稀少，而且一般出於近現代，從漢到清，人們都無緣得見。《易林》也不例外，其內容是流傳下來了，但並不是漢朝的原件，上面即便題了焦延壽的大名，也有充分理由懷疑它的真實性。只是這書歷來引不起人們多大興趣，所以陳陳相因便都說這書是焦延壽所著，很多書目、刻本索性題作《焦氏易林》。

到了明代，人們對《易林》的關注漸漸多了些，讀書加思考便終於引出了一場有關《易林》作者的官司。

爭議的始作俑者主要是明清的兩位學者。第一位是鄭曉，他寫了篇文章，總其大意，可以歸納為兩點，一是漢人沒說《易林》是焦延壽寫的，二是有些林詞似乎是說焦延壽身後之事。（他的議論見於《端簡鄭公文集》卷一，本書附錄收入。朱彝尊作《經義考》引了他的文字，不過只說「鄭端簡公曰」，沒有標明出處，撰寫《四庫提要》的館臣想當然地大筆一揮加上了出處：《古言》。《古言》是鄭曉的著作，但裏面沒有這個內容。這下害苦了後人，直到胡適、余嘉錫都沒找到鄭曉這番話的出處，只得聲明是轉引。）第二位是顧炎武，他的《日知錄》有一段相關議論，重點在鄭曉所言的第二個方面。

這個問題沈寂了一段時間後進入了高潮。嘉慶年間，有兩位學者差不多同時給《易林》作了注本，彼此的注可說半斤八兩，但他們的序跋却使論戰升級了。稍早些的是翟云升的《焦氏易林校略》，奇怪的